

重点
阅读

蒋蓝的文学踪迹史

——漫谈蒋蓝的《石达开与雅安》 □王 火

蒋蓝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能努力下苦功、不怕艰难的作家。他如果写抒情性的散文，一样会写得很出色。但从2011年开始，他开始着手《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晚清西南》这样一部长篇散文的调查与写作，这就决定了他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写作之路。倏忽十年过去了，他再接再厉，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同一题材的《太平天国第一王——石达开与雅安》。在我看来，这不是重复，而是思想精进与史料反复厘定、文学深化的可喜结果。

我知道，这几年蒋蓝在研究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晚清挥师突进西南之余，还在着手古蜀王朝以来的四川历史的系统思索，他也在写工程浩繁的《成都传》。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接合部的许多地方，蒋蓝一直跋涉穿行其间。他前后购买了太平天国以及地方史料上百种，反复阅读，条分缕析，然后采用纸上史料与出土文物、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把历史研究最后落脚于文学的非虚构写作领域，为我们复原出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西南生活史与风物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西南空间的认知。

《石达开与雅安》是一部读来津津有味的长篇纪实作品，也是一部有历史意义、历史价值，又具有生动文学笔法、叙事叙事、动人心魄的长篇非虚构。蒋蓝曾经说：“用几年时间来全力完成一件事，长期奔波于田野山河间，在我生命中估计没有第二次！”“写作中，我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官场文牍、稗官野史、江湖切口、烟帮密语、袍哥茶阵、天国客家用语等等构成的专属空间与特定时间，我才可能竭力成为一个文学与文化符号的福尔摩斯。”“我相信，我追踪的四川提督唐友

耕与翼王石达开的踪迹，所带出的1850至1900年之间的四川官场史、军事史、民俗史、植物史、道路史、城建史乃至风化史，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再现努力……”

我赞赏蒋蓝这种有大气魄、有雄心、知难而进的创作态度与风格。他无心取悦于文坛，但取得的效果却必然使对这种作品有兴趣的读者得到赞叹与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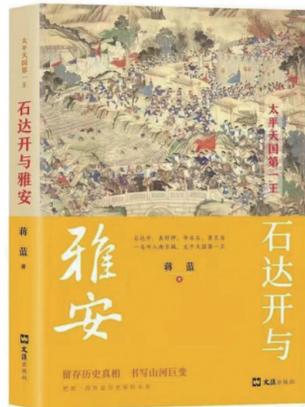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蒋蓝是能真正深入到他要写作的那种生活中去的，尽管艰苦而且艰难。事实上，今人写过去的旧时代和旧人物，总比深入今天的生活写今天要困难，但他是努力深入了，而且确有所得。他的作品感染了我，我仿佛能看到他站在大渡河岸边面对大风呼啸、波涛滚滚，遥想当年石达开在此艰难作战的情景；又仿佛能看到他在寂静的深夜里钻研白天采访到的散乱资料；或是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孤寂简陋的客栈小屋内听着雨声奋笔写作……

书里写到过一件使我感动的事。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凌迟，关于其殉难的地点，蒋蓝采访收集到五种说法。当他向成都两位学者发去求救电邮后，一个寒冷的冬日，在家里回复来了，他突然发疯似地对妻子说：“走，穿厚点，我们开车出去！”从成都九眼桥家中到达督院街口的“院门口”，已是深夜十一点半了！把车停下，面对深夜一个人都没有的冷清的大街，他对妻子说：“相传这里是翼王石达开被凌迟处，当时翼王等人从科甲巷省臬台监狱被押到总督衙门受审，必须经过这里……”妻子在寒风中忍不住说：“你这个疯子呀！来看什么？鬼影子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不是笑话，而是痴心于创作的蒋蓝沉迷于创作踪迹史的正常表现。

有时候，文学创作也是需要一些这种“疯子”精神的。书中的翼王石达开，写的只是兵败大渡河直到被杀害就义的那一段，但分量厚重，尤其是被残忍地一刀一刀凌迟处死，蒋蓝写得淋漓尽致，使我看得心悸手冷、血压升高。他引用的资料详尽而可靠，对历史上一些这方面的争议，大有“钥匙开锁”的意义与作用。涉及石达开的字数，占本书约四分之三，但分量厚重，大气磅礴，感人至深，能引人浮想联翩，亦能使人热血沸腾、唏嘘长叹。

唯有作家写历史，才可能这样淋漓尽致！蒋蓝不仅是一个“写书的人”，也是个“读书的人”。他博览群书：正史野史、诗词歌赋、中外典籍直至写作本书时所能见到的一切文史资料、四川典籍、地县方志、信函日记、档案文件、民间传说、地图照片、老人回忆以及书中人物后裔的叙述等等，均在阅读研究及考据之列。于是，此书得以丰满、得以完整、得以可信、得以成功。

我想，《石达开与雅安》如果不是作家来写，而是纯由历史学家来写，可能不会像蒋蓝这部述作感人而且吸引人阅读。这部长篇出自一位有思想的作家笔下，是集文、史、哲于一体的作品。书中插有数十幅照片、插图，也为内容增色不少。文学作品重于塑造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当然也要同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学笔法及文句、叙事、写景、状物等。史学家重在发掘、研究，重在实地考察及潜心考证，有所发现和前进。哲人则从学术角度体现人之才能识见，从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之累积及体悟中寻觅出规律、法则及正误之道。蒋蓝在处理文史哲的问题上做得很出色。他是作家，文采斐然，他写踪迹史，自然要作为存真；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想象力的作家，于是自然而然而



在美文并不揭露什么主义，但常常在叙事叙事时颇多哲思，或诗意盎然。文笔锋芒，有时甚或带有“野”气，但这些都是既尊重史实又尊重文学性基础上写踪迹史的必要和可贵之处。

分析历史可以发现，自从1862年2月20日石达开从湖北利川进入四川石柱，与清军拼死一搏的十几次大小战役，实际上就是强渡与反强渡之间的博弈。我们以往均记载，1863年3月石达开是从巧家县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的。但蒋蓝的考据结果不同，从他书中的史料可见：浩大的金沙江竟然千里冰封，翼王部队是从结冰的江面，踏着被冻硬的将士身体，走进进入四川境内的。冰封金沙江！一定是石达开平生未见，也是我们史料里发现的唯一一次记载。

蒋蓝说过：“人迹是构成史迹最重要、最深切的痕迹。”我同意这个观点。写《踪迹史》已经太过艰难，而接着完成《石达开与雅安》更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挑战。但蒋蓝这部作品应该说是一部成功的述作。

我以为，有的书会过时，蒋蓝这本书是富于生命而不会过时的！他吃的苦、受的艰难太值得了！

■新知新思

某年夏，我陪父母在杭州西子湖畔度假，得以结识作家徐剑。此后，虽再无晤面，但有微信联系，也并不觉得疏于问候。前几年，建党百年在即，有不少出版机构或有关方面就此策划选题，已推出的文本不少，杂花生树，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徐剑也应邀要写一部关于建党之初的书稿。他曾与我联系，谈到自己的构思设想。我向他推荐了此前几位作者的文本，以作参考，也期待他的著作能够早日问世。大致到了去年年末，《天晓——1921》终于付梓，发行全国。徐剑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寄书给我，盛意可感。春节多闲，细读此书，很为徐剑高兴。他的这部《天晓》虽然姗姗来迟，但好书不怕晚，仅就党史的非虚构写作而言，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推陈出新颇为成功的难得文本。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严谨。党史的叙述与书写，看似容易，实则难度很大。难度大不仅仅在于政治性强、要求高，还在于作者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伪存真、严谨选择、作出判断。应该承认，时至今日，党史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阶段，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与体现。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众多的甚至是芜杂的文献材料中审慎取舍，不被云山雾罩所左右，更不能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轻率行文，率尔操觚，甚至闹出各种笑话来。徐剑出身行伍，著作累累，写作经验丰富，而他涉足这一头绪纷乱、卷帙浩繁的党史领域，不惮繁难，为写作《天晓》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文献。针对这些资料，徐剑都是认真选择，加以甄别，并不因人废言，也不轻率地以个人是非而持某种说法，体现出一种严肃写作者的郑重严谨态度、一丝不苟的职业素养。徐剑讲到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多人回避戴季陶与邵力子，但徐剑采用了戴季陶说，也是一种求真与严谨态度的重要体现。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在场。一百年前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置放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如何引发读者的兴趣？如何摆脱史料的堆砌与当今的隔膜？徐剑处处注意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的关联，他沿着一大代表们的活动轨迹，多样故土进行的深入采访与寻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就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寻访，特别令人耳目一新。韶山、独秀山、湘江、长江、橘子洲头、江津小城，并非蜻蜓点水式的走马观花，而是置身其中，历史与现实不断交错却又让人毫无违和之感。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备受关注，话题性强，自然是书写的重点；但就董必武、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陈公博等其他人，徐剑也并非虚晃一枪、一笔带过、草草了事，而是尽可能地细致深入，抵达这些人物生命诞生之地，感受体悟，反复思量，元气淋漓，行诸笔端。杨明斋、刘伯垂、李书城，这些历史人物也被徐剑脉络清晰地一一钩沉出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天晓》的难得，在于它的构思。关于建党之初的文本已经多多，说是汗牛充栋也并非夸张。如何力避繁复、不炒剩饭、不拾人牙慧、推陈出新，这对写作者是一大考验，也是一种挑战。徐剑选取李达的前妻王会悟来叙述建党之初，有着强烈的代入感与真切感。但徐剑又没有局限在王会悟的叙述之中，他收放自如、云卷云舒，看得出来，就叙述的技巧，他很是动了一番脑筋、费了一番思量。维斯基来华的细节，马林其人的个性特点，杨明斋的身死异域，被许多人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但徐剑没有放过这诸多关键节点，他基本梳理清楚了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最初接触的大致细节。聚焦1921年，徐剑也并没有铺展开来、照单全收，做出详尽的年表，或者如有的写作者从建党之初写到遵义会议，给人以过于枝蔓之感。而聚焦1921年，他也不是就此年的风云激荡弓开拉满月，而是删繁就简书写了十天的惊心动魄、十天的风风雨雨。十天与百年，彼此呼应，浑然一体，很见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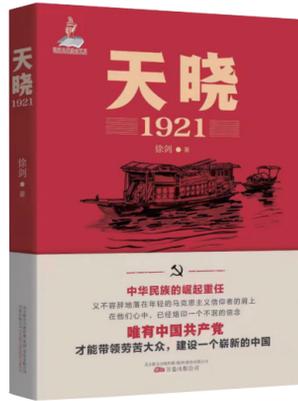
《天晓》的难得，还在于它的语言修辞。历史书写的语言运用之妙，各有不同。徐剑特别注意语言的修辞，娓娓道来，用辞考究，华丽而不做作，深情而不煽情。即使参加一大代表究竟为12人还是13人这一“历史公案”的叙述，也是张弛有度、引人入胜。陈潭秋和董必武都证明与会代表为13人，后李达认为是12人，参会者包惠僧不在其列，苏联方面提供的档案也记录为12人。但包惠僧写出两篇万言书，陈述自己为正式代表。石川浩治则推论多出一人为陈公博，真可谓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徐剑在众说纷纭中条分缕析，最终采用了“包惠僧只是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这一说法，认为他终其一生，“永远是一个局外人”。这样的结论看似残酷，却也大体符合历史的事实。

党史学习，常学常新。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回首党的百余年艰苦卓绝筚路蓝缕，增强我们在新时代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的决心与信心，读读《天晓》，应该大有裨益。

推陈出新说开端

——徐剑《天晓》读札

□雷雨



■开卷絮语

一霎春潮到川乡

——读李明春长篇小说《川乡传》 □张 咏



处都不满意，闹着要分手。欧阳生闻讯后，竭力做楚姑娘的思想工作并代表政府表态，保证在他们结婚前“路修通、电接上、手机联网”，又逐一做好贫困户的思想工作，动员山上贫困户全部搬下山、住进新居，最终岩岩和小楚得修正果，回到深圳就结了婚。此事作为书中潜伏暗藏的一条隐线，折射映衬出扶贫干部矢志攻坚之心志毅力，恰如欧阳生脱口而出的“扶贫金句”——“扶贫最不能缺的是感情”，“扶贫不是施舍行善，对贫困户要当亲人看，要有愧疚心理”，“扶贫最忌动气骂人，贫困户的好评是验收的第一标准”，“堪称三复斯言。正因为作者有着一线基层干部工作经历，感同身受、推己及人，故全书行文走笔宛曲有致、平险交错，用力深沉凝重、情感深入熨帖，描述破除历史积弊、走向时代辉煌，极富穿透力和纵深感，令人信服感佩。

贫，为川东区域之古老居民，史载该乡人勇猛彪悍，勇于攻坚克难、攻城拔寨。今之贫民亦葆有此一种族基因。而面临着山中原住民管恪守先祖遗训“穷不出山”的棘手现状，欧阳生接踵继武古贤人之勇毅精神，锐意脱贫攻坚，慨然以乡民安居乐业、剪除穷根为己任，“改变苦涩的安居乐业，面临岩岩的背井离乡”，念兹在兹、夙兴夜寐，可谓当代廉干之能吏；而其艰苦卓绝、不畏鬼神处，颇有类于

勇率子移山之愚公、厉声捉拿穷鬼之钟馗！

李明春对于书中川乡所在地——川东渠县之风物民情、人文地理，成竹在胸、了然于心，笔之所向，诸多人物事件俱能安排妥帖，宛若天成。行文风格尤其是人物对白，多运用接地气的百姓语言，干净利落爽脆，无拖泥带水。只缘数十年基层干部的生活历练和工作经历，其身心早已与群众熔炼化合为一体，所见为百姓事、所说为家常话，故能令人读来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概而论之，《川乡传》为描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暨现代化历史宏伟征程之力作，笔力雄健挺劲，思想深邃超卓，行文活络灵动。作为近两年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共同扶持、合力打造而成的一部重点作品，《川乡传》聚焦民生热点、瞩目脱贫伟业，抒写党群干群情同鱼水之关系，无愧乎描摹时代之精品、文艺创作之高峰！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因之时不我待地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数以千万计欧阳生式的基层党员干部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夙兴夜寐、无间寒暑，勇于拔钉子、啃硬骨头，以愚公移山、夸父逐日之持久不懈精神，矢志推进脱贫攻坚这一拯救农村的伟大历史工程，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使闭塞无垠的恶水穷山转身蝶变为新绿满目的金山银山。交通天堑变通途、居住茅屋改新房，处处呈现出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辉煌画卷，可称彪炳史册之人间奇迹。此皆缘于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以及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之英勇宏伟举措，彰显乡村振兴谱写锦绣新篇。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正乃李明春笔下川乡之真实写照！

自古迄今，扶贫济困对社会底层民众及弱势群体投注以援手与热忱，素为治国安邦、稳定社稷之社举伟业。今日扶贫工程之远大型许与终极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奏响主旋律、最强音。

辛丑初冬，接读四川籍作家李明春近著长篇小说《川乡传》（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感怀颇多。该书以四川贫困山村区域为样本，聚焦当代中国之脱贫攻坚伟业及乡村振兴战略，识见深而笔力重，亦传亦史、交互穿插，洋溢充盈着浓郁深沉的人文关怀与家国情怀。

全书浓墨重彩描绘川东渠县三江镇柿子坪贾人谷沧桑巨变、曾氏家族命运转折，兼以主人公欧阳生之个人遭遇、成长历程纵贯其间，由个人而至家族、山村乃至家国，历史纵深感、厚重度并行，管中窥豹、见微知著，藉此映射烘托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华夏大地所发生的剧烈巨变。通过描摹刻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贾人谷贫困户在欧阳生一千人的毅然率领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重整河山，任凭双手来再造一个光明灿烂、前景壮阔的新川乡。恰如作者于后记中所言，“叩问改革动因，一定要有人口与土地千年撕扯的痕迹，要有根源性思考。农民不能是一个符号，要着笔于他们的利益、诉求、处境、个性……”，贾人谷中的诸多小人物、小情节、小情调、人情事理、喜怒哀乐及爱恨情欲纠缠环绕一处，格局开阔正大、格调高雅华美，蕴藏有意韵深重、俯接地气的赤子之心和悲悯之情。

书中主人公欧阳生带领当地百姓从合作化大生产到包产到户、创办乡镇企业、下海经商，再到返乡重建家园故土等历程，壮阔展现一系列社会性重大变革。作者李明春亦有与其近似之生活历练，故其下笔别具一种了解之同情，虽未可断定《川乡传》即其自传式文本，然欧阳生身上或当留存有李明春之人生烙印与痕迹，关心民瘼、倾听民意、垂注民生，用力勤而持日久，久久为功、集腋成裘，遂能在脱贫攻坚之伟业壮举中助力良多。

说到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川乡传》最后部分有一事例可资佐证。曾氏家族曾山之子曾岩和湖北姑娘小楚在深圳打工相识，曾岩带她回贾人谷专程核实“看家底”，可楚姑娘却嫌弃贾人谷没电、没网络、没通公路，看了环境和住

秦锦屏是深圳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剧作家。作为一个少见的文学多面手，她在诗歌、小说、剧本、非虚构写作等领域都卓有建树，成为深圳文艺界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就秦锦屏的散文作品（或者说非虚构写作），她的长篇主题散文《女子女子你转过来》曾引起较大反响。作者善于从生活琐碎的细节中发现生活的整体性，展现日常生活中令人惊讶的一面。关于《万木生芽》这部最新散文集，我结合作者的总体创作，尝试从如下几个关键词进行解读。

神气

秦锦屏作品，篇篇有人，篇篇有物，篇篇有神，篇篇有物象的活动，有物象的灵魂，或者归结为篇篇有“我”，元气淋漓、神气十足、气韵生动，写出来的是“有我之境”。

秦锦屏的散文作品，读来总是让你无法平心静气，无法与自己无关。这样一种感染力、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是少见的，也当是她的看家本领。在这种移情、共鸣、共情效果背后，正是她的作品所彰显的强大的内在主体精神的力度和烈度，神采之后的文气的一气呵成一气周流，文气之后的辞采华美音韵铿锵珠落玉盘，语言修辞音节错落的协奏之妙交响之美。

风格

秦锦屏散文作品的风格是绚烂热烈、繁丽丰硕、制局精严，甚至喧哗热闹，与安静、冒犯、冲淡等美学范式都迥乎不同。即使是题材私密化、个体化的作品，也能写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劲、疯劲。

总体来说，秦锦屏的文学旨趣绝非不痛不痒，而是有浓烈情感的融注和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风格即风格格局、品味格调，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作家就如同自带核反应堆，精力旺盛，情感饱满，生命力蓬勃，秦锦屏以文字建构起精神内在宇宙的形式和秩序。

当然我们也明白，这种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写作，并非现实主义写作。作品其实篇篇写法不同，所同者惟饱满元气、火辣情感，催泪代入，篇篇感人。

典范性

作者是少见的鲜有语言字句毛病的作者，是典范的汉语写作。比如，一篇写好人好事的报告文学《音符》，以七个音符来结构，体现了一种象征化处理的匠心，平常文章也能写出大格局。

其他，《麦儿黄》，是端阳最有童趣；

书香茶座



《没有落叶的城市》写出父之子女的深恩，令人悲喜交集；《那天大雪纷纷下》中猫妈妈的爱子护子之情写得惊心动魄，最后的结局令人肝肠寸断。这三篇文章当都是典范的儿童文学、当代儿童文学

神气·典范·越界

——对秦锦屏散文集《万木生芽》的一种读法 □于爱成

的典范。《阅读红树林》巧用象征，将红树与具有红树精神的义工做了巧妙的转换，转换之妙不漏痕迹而无缝对接；《羌绣》章章显志，全篇写到了极致、感人到了极致，但最后一句强大的象征性无以复加。这样的作品，也包括《音符》《城里的爸爸》《我要为你唱首歌》《那时正年少》等。

说到底，骨子里的秦锦屏，其实正是儒家精神的传承者，文以载道，文质彬彬，即使热烈的情感，也总能回到“哀而不伤”，理性总能或努力控制住情感的泛滥。

精确与形象

所谓精确，不仅仅指遣词造句怎样准确，而是有更系统性的要求。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就将他心目中的“精确”归结为三点：一、作品的构思非常明确；二、视觉形象清晰，令人难忘；三、语言尽可能精确，词语要准确，要充分表达各种思想和想象的细微差别。“精确”和“形象”，其真正是秦锦屏散文

在叙述方面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万木生芽》中的文字极为准确，干净利落，笔笔到位，有强烈现场感。其实，这就说到了作者语言文字的赋型能力。她有赋予语言文字形式、秩序、生命的特殊本领，这种能力就是塑造形象的能力，以人物为中心的能力，把人写活的能力。人活了，人的环境也就动起来了，而不是相反。她能把人放在环境中，环境成就人，人在环境中如鱼得水，从而形成一个场域、一个世界、一个宇宙，栩栩如生，仿佛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活生生在我们面前发生。

我们在《万木生芽》中，看到的正是意象和意象之上的形象，以描写而不是任何理论议论建构的形象、推动的叙事。这形象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人，应了作者书名“万木”的初衷。

边界与越界

集子中写见闻感受的部分文章，可称为散文正宗；而有小说化、诗化、戏剧化叙事的部分，则有一定扩展散文边

界的尝试。这些部分亦真亦幻、亦实亦虚，有适当虚构的融入，写出来别具引力和精彩，显示了作者文体方面的自觉探索。

《万木生芽》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带来最强烈冲击的，恰恰是几篇回忆自己父亲、姥姥、奶奶，以及另外几篇写人的文章。这些作品都以塑造人物形象、人物性格见长，都通过动作、表情、对话，通过具有戏剧性包括传奇性的情节，通过通篇的描写而非夹叙夹议的叙述手段，塑造出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这一个”——父亲是“这一个”，姥姥是“这一个”，这两个人物形象是如此奇特，如此迷人，如此不可复制，在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找不出来与他们相似的第三人。

这样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并能引人瞩目、过目难忘，小说技法的借用是厥功至伟的。人物的出场方式、欲扬先抑抖包袱埋伏的故事结构、大量的人物对白、正叙预叙倒叙插叙等各种叙述手段、情节的反转结局和意外人物的复杂性等等，如此种种，都使得秦锦屏的大量怀旧题材类作品充满极强的故事性和小说的匠心，成就了其在散文（或者说非虚构写作、新散文）体裁创作上的独特性。秦锦屏不愧是当代文坛散文写作的妙手。